



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五个 需要深入讨论的难题



【财新网】（专栏作家 周天勇）笔者自 2014 年以来的经济问题和学理研究，主要是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想比较客观地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持续下行；二是想比较客观地研究中国还有没有各方面的潜能，能不能找到一个能够中高速稳定增长的思路和方案。假定的两种情形下，笔者不会对此投入精力：或者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没有必要由更多的学者去重复劳动；或者怎么研究，未来经济也会进入低速增长区间，已经根本无法改变。通过近 5 年时间的观察与思考，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有中高速增长的可能。因此，下面将我的思考和学理探讨进展分享于此，希望与大家进行讨论。

导言

中国经济体系及其运转和增长，既区别于发达市场国家，也与纯粹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发展中国家不一样，还与 5 年左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瞬时转轨的国家也不类同。中国是一个从计划体制中生长和发育市场经济、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并存和二元体制向一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轨的渐进转轨国家，一是这种二元体制转轨了 40 余年，可能还需要 10 到 15 年左右的时间，因而是一个特长周期的体制转轨国家；二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既要结构转型，还要体制转轨，是一个双二元转型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第一、经济规模第二和国土面积辽阔的国家，40 余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应当积累了深入研究中国经济丰富的学理素材。

而基于现有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逻辑方法，对中国这样一个二元体制经济进行解释和分析，可能会有较大的缺陷和不足。对中国经济的学理性解释和刻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很多突破性的进展。笔者及笔者率领的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的团队，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也只是沧海一粟。

经济增长奇迹来源的解释

(1) 1978—1997 年经济中高速增长来源的解释

从生产增长看，一元计划向二元市场部分的发育使被计划体制长期禁锢而闲置和低利用的要素，开始得到高效率的配置和利用。工业和农业体制改革获得全要素生产率，体制长期压抑的居民消费意愿在改革提高其收入水平中被激发出来，扩大了生产的市场容量，生产力得以释放。这是 20 世纪最后 20 年经济高速增长潜能来源的经济学解释。

大力度改革周期中，由于体制转轨改善闲置要素的配置，提高低利用率要素的产出率，使改革形成的 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倒 V 形状，而据琼斯和菲斯佩观察，在一个特长时间中，广义技术进步 TFP 增长是一条近乎平行的曲线。这个发现应当是从方法上认识和合理解释中国作为二元经济体制转轨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来源的一个关键：假定广义技术进步产出贡献增长无论是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体制转轨国家，都是一条平缓和平行的曲线；那么，在中国以往体制改革周期时形成的 TFP 增长倒 V 曲线与平缓曲线之间的积分，就应当是体制改革带来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

置效率改善而获得的 TFP 产出。

(2) 1998—2010 年经济中高速增长来源的解释

而 2000 年到 2010 年高速增长经济的来源，除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外，主要潜力是资源、城镇生活资料性和生产资料性的土地房屋市场化和资产化形成的。在二元体制经济中，土地房屋零价格向市场价格突然上升，支出方面形成房地产开发者、用房经营者和居民的投资购置需求，分配方面形成了政府的卖地收入、有关税收和企业的利润及其居民出售二手房的溢值收入，生产方面必须以物业租金、居民出租收入、居民自己住宅给自己交房租（虚拟核算）、与建筑物不可分的资本利润折旧（实际是地租）等来进行平衡。不论统计上用什么样的办法去核算，实践上这种没有价格的资源、资料性土地房屋的市场化、资产化和货币化，形成了财富溢值型的 GDP。二元体制国家，非交易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的额外 GDP 获得为：

$$\Delta A_3 = Est \times Chr \times Epr.$$

这样，从核算 1978—2010 年经济增长奇迹时，前一阶段为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获得的 ΔA_2 潜能推动了经济增长，后一阶段则是资源、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性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财富溢值 ΔA_3 成为经济中高速

增长很重要的潜能来源之一。基本模型为：

$$Y = \frac{\Delta A_1 + \Delta A_2 + \Delta A_3}{A} + a \frac{\Delta W}{W} + b \frac{\Delta K}{K}$$

逻辑思路和范畴

二元体制并存使要素配置受到计划或行政与市场的双重调节，因此信号扭曲常态性存在；这种体制扭曲可以被经济主体追求利益的行为所纠正，但相当多的扭曲具有不可纠正性；而这种体制扭曲与非扭曲相比，在配置方面造成了“低效率—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体制剩余性要素”及其产出损失，在需求方面造成了“人口—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循环和流量的扭曲及其消费需求损失，在经济体系的资产供给方面造成了“GDP+资产—货币—债务”循环和平衡及其稳定抵押信用的缺失。

体制性扭曲差值和体制扭曲性剩余。而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又是经济稳定增长的体制性生产要素剩余、体制性消费需求剩余和体制性可抵押资产剩余，均是经济增长投入、增长需求可能性扩张和稳定增加可抵押信用的潜能。这些体制性扭曲如果不能被不断的市场化改革所纠正，经济增长会处于自然失速的状态。

我们可以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些参照值标准化，用反事实方法计算二元体制各类扭曲值，进而求出体制扭曲差值这一二元体制经济最基本的变量，并用市场机制还原的逻辑，测算改革纠正扭曲形成的新经济增长生产、需求及其稳定的潜在能力和潜在保证。

学理上一个重要的突破是：体制性要素扭曲差值成为改革与增长数理关系研究的内生变量。在讨论未来二元体制经济增长时，在生产侧可以根据其先求出各类生产要素闲置和低利用的规模，即体制性要素剩余，将这一变量内生地植入生产函数，再测算其市场化配置改革后释放的潜能，使改革与增长的关系，有了一个较为靠谱和科学的计算方法。

基于这样一个二元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及其分析方法，通过建立模型、模块耦合和编程调参，初步形成计算体系，来模拟各类要素不同部位和力度的体制改革、调水改土发展战略和开放格局的方案安排，以预判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需求侧可能性和资产能够保障的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性，为决策提供学理、模拟和不同结果方面的参考依据。

土地要素基本没有市场化配置，其不可纠正部分造成了大规模的体制性剩余土地；并且中国国土的耕地比率，以及其他建设用地比率还较低。调节水资源配置、新增可利用土地，特别是增加建设用地，可以使土地要素的投入曲线从垂直状态改为向右倾斜的曲线。

二元体制经济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

一般认为，一个体制既定市场经济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和不引起通货膨胀，包括其他各种资源正常充分被利用时，经济增长所能取得的可持续的最大增速。从经济增长核算看，潜在经济能力在增速方面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及其报酬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当流动性不足而经济衰退时，施以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可以使较低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水平上。

在现代经济学中，“自然经济增长率”的准确定义应当是指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者地区中潜在的产出和增长状况。显然，对特长周期转轨中的国家来说，其二元体制并不符合这一定义暗含的必要条件。那么，如何计算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呢？笔者认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没有改革，或者说改革不到位场景中），应该用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来计算。理由在于：首先，新古典产出和增长模型认为体制是外生给定的，并且假定体制不会发生变化。基于此，我们可以观察体制不改革或改革没有落实场景中，广义技术进步、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其次，新古典产出和增长模型中没有包含土地要素这一变量，显然，发达国家符合土地已经资产化和国土开发利用成熟这一场景，转轨国家也符合土地体制改革没有落实、土地资产化进展慢和土地要素不再增加这一场景，所以土地要素变量也可以在模型中被忽略。最后，通常来说，索洛模型将 TFP 只定义为广义技术进步，不包括体制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也不包括大的改革推进技术进步和技术产业化，符合改革没有被落实的场景。

教科书上的定义没有错。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核算的模型，暗含的假定条件是市场竞争性的经济，不存在体制扭曲造成的要素闲置和低利用。然而，一个从单一计划经济向市场和计划二元并存体制转轨的国家，存在着体制扭曲。一方面，这种扭曲不可由经济主体纠正时，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大规模的闲置和低利用，也就是体制扭曲性的要素剩余。另一方面，推进重大的改革，往往使体制性剩余得到充分利用，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数量投入没有增加情况下的大幅度增长，实质是改革体制扭曲使经济增长得到了体制剩余被再利用带来的潜能。

需要强调的是，自然经济增长率，在二元体制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的增长潜能是体制性要素剩余，后者的增长潜能是市场景气回落生产能力未能满负荷利用的空间；前者增长潜能得到充分利用的关键措施是改革体制消除扭曲，后者的关键性措施是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消除流动性不足。也就是说，主要依靠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刺激由于体制扭曲造成的生产要素剩余、消费剩余和资产剩余；只有体制改革才能挖掘这种类型的潜能，将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体制改革型潜在增长率）尽可能高的水平上。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8274

